

■ 學門動態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黃光國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所)教授
國家講座教授

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

我從 1980 年代開始，即致力於從事本土心理學研究。從 2000 年開始，擔任「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總計畫主持人，今天在這篇題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文章裡，我想摒棄掉一般論文「去個人化」的傳統寫法，從個人近年來幾次參加國際學術活動的經驗，來談談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

一、心理學本土化的潮流與困境

在開始討論這個主題之前，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大家都知道，最早在台灣提倡心理學本土化的先驅是楊國樞教授。事實上，心理學本土化是個世界性的問題，從 1980 年代開始，菲律賓、印度、加拿大、韓國、日本、波蘭等各地，都有人在從事本土心理學的研究。2002 年七月 7 日至 12 日，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二十五屆國際應用心理學大會」(XX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Psychol-

ogy)上，加拿大馬尼特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教授 John Adair 便組織了一個研討會，題為「世界各地的社會心理學：歷史根源與後續發展」(Social psychology around the world: Historical roots and subsequent development)，邀請六位教授，分別討論本土社會心理學在台灣、印度、拉丁美洲、加拿大、和澳洲各地的發展。他之所以會發起籌備這樣的一個研討會，顯然是看到了本土心理學在世界各地此起彼湧、不斷浮現的一種趨勢。

然而，我也必須指出：不論在那一個地方，本土心理學的發展其實都已經遭遇到相當多的困難和挑戰。大體而言，我們可以說：世界上各個不同國家的本土心理學，都是由少數幾位心理學者，帶著他們的學生在做，並不受到主流心理學家的認可。等到這幾位學者不再繼續從事本土研究，該一地區的「本土心理學」便逐漸宣告沉寂。譬如，菲律賓就是一個很好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的例子。在國際學術界最早提倡本土心理學的人物，是菲律賓的 Enriquez。他的研究成果不僅受到國際學術界的矚目，他的學生也在菲律賓組織了一個規模不小的「本土心理學會」。然而，自從 Enriquez 於 1994 年因為罹患癌症而英年早逝之後，本土心理學在菲律賓的發展，便出現了「後繼無人」的窘境。Enriquez 的學生雖然繼續在作本土心理學的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卻很少受到國際心理學界的注意，而在國際上變得不活躍 (Internationally inactive)。

本土心理學的發展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後繼乏力」的窘境，主要是因為這樣的研究取向有其內在的困難，而不斷受到國際主流心理學的質疑和挑戰。我可以舉一個小故事，來說明這一點。在新加坡的 ICAP 年會裡，我在 Dr. Adair 的研討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題為：〈從殖民主義到後殖民主義：台灣本土心理學的發展〉，討論台灣發展本土心理學時，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上所發生的各項爭議。接著，主辦單位又安排我作了一小時的主題演講，題目為：〈建構實在論與儒家關係主義：發展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策略〉，兩場演講都在同一會場，而且時間相連，前者討論本土心理學所遭遇到的

困難，後者則側重於我對於解決這些困難所提出的知識論策略。

Dr. Adair 在籌備第一個研討會的時候，我將這兩篇論文寄給他，他看了之後，又邀請我參加 2002 年七月 15 日到 19 日在印尼日惹舉行的「第十六屆國際跨文化心理學大會」(XVI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到他和 Dr. Gabrenya 組織的另一個研討會「本土心理學的研究與反思」(Research and reflections o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發表我對第二篇論文的看法。我到會場，拿到會議議程及摘要之後，仔細一看，才發現：參加這場研討會的五位教授，只有一位印度女教授是在談本土化對印度心理學發展的影響，除此之外，Dr. Adair 的論文題目是：〈對於本土心理學支持者的基本問題〉(Basic questions for proponents of indigenous psychologies)，Dr. Grabrenya 的題目是：〈從科學社會學及社會運動的觀點來理解本土心理學〉(A sociology of science,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digenous psychologies)，Dr. Poortinga 的題目是〈在本土心理學中文化強加是否不成問題？〉(Is cultural imposition less of an issue i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乍看之下，這三篇論文似乎都是在討論類似的主題，然而，如果我們瞭解這三位作者的背景，卻可以發現：其中大有文章。Dr. Adair 是本土心理學的支持者，他自己本人便在加拿大從事本土心理學的研究，研究成果豐碩，在2002年的ICAP年會上，他是獲得大會表揚的三位傑出心理學者之一。他提出的問題可以說是他多年來從事本土心理學研究工作的反思，這些問題也是他個人想要解答的問題，他對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態度基本上是友善的。

Dr. Gabrenya 是《跨文化心理學報》(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Bulletin)的主編，曾經數度來台灣當訪問學者，他自己雖然不從事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對台灣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卻有相當程度的瞭解。Dr. Poortinga 是荷蘭帝堡大學(Tiburg University)和比利時魯汶大學(University of Louven)的教授，他雖然也長期注意本土心理學的發展，卻經常發表論文，針對本土心理學運動所遭遇到的問題提出批評。他的論點基本上代表了西方主流心理學的看法。

唸過西方心理學史的大多知道：科學史可以分為「內部史」(internal history)和「外部史」(external history)

兩大類；所謂「內部史」是在研究科學發展上所遭遇到的問題，以及科學家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所謂「外部史」則是研究科學發展的歷史和社會條件，包括：科學社群與政治中樞的關聯，科學社群的權力結構和資源分配等等問題。Dr. Gabrenya 的論文基本上是從「外部史」的角度，來分析台灣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把它當做是一種「學術運動」來加以理解，而不是從「學術」的角度，來分析它。Dr. Poortinga 的論文則是從「內部史」的角度，討論心理學本土化所遭遇到的內在難題，他的著眼點在於世界各地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並不僅限於台灣。然而，台灣本土心理學的發展仍然必須面對這些問題。換句話說，從科學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本土心理學的發展可以說是面臨到一種「內外夾擊」的局面：就外部史而言，我們必須釐清：心理學本土化是否祇是一場涉及權力分配的學術運動？就內部史而言，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回應主流心理學所提出的種種挑戰？

二、心理學本土化的內在難題

然則，本土心理學者該如何應付這種「內外夾擊」式的挑戰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瞭解：從「內部史」的角度來看，本土心理學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的發展，到底遭遇到了那些難題？大體而言，世界各地本土心理學的崛起，主要是出自於非西方國家的心理學者對於盲目移植西方心理學的研究典範感到強烈不滿。1981年，楊國樞和文崇一在發起舉行「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和中國化研討會」時，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便清楚地指出：

在各個社會及行為科學的領域內，中國學者確曾做過若干研究。但是，我們所探討的對象雖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所採用的理論與方法卻幾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中國人；在從事研究工作時，我們卻變成了西方人。我們有意無意地抑制自己中國式的思想觀念與哲學取向，使其難以表現在研究的歷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評的接受與承襲西方的問題、理論及方法。

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學術反殖民主義」的精神。由於對西方「學術殖民主義」感到強烈的不滿，許多非西方國家的心理學者紛紛主張：心理學應當採取「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徑，考慮本地的社會文化傳統，運用本土社會中所流傳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研究本土社會中人們的心理，務使心理學的研究能夠有

「社會相干性」(social relevance)、
「文化相干性」(cultural relevance)、
或「本土契合性」。

然而，主流心理學者對於這樣的主張卻是深深不以為然的。譬如，伊利諾大學的資深心理學教授 Triandis (2000)便很直率地指出：本土心理學者的這種主張，和人類學家的主張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這種人類學式的心理學研究，對於科學心理學發展的貢獻，其實是十分有限的。

Poortinga(1999)主張：人類應當有同樣的心理功能(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s)，本土心理學所強調的研究對象，其實是特定文化中人們心理的內涵(contents)，而不是人類共同的心理功能。他指出：本土心理學的最大限制之一，便是本土心理學者在談到「本土心理學」這個概念時，是使用複數(indigenous psychologies)。如果每一個文化都有自己的本土心理學，請問：人類將會有幾種本土心理學？在某種特定的社會文化中所發展出來的本土心理學，對其他社會或文化中的人而言，又有什麼樣的意義？

何友暉教授是本土心理學的支持者，他也主張：亞洲心理學者應當發展「亞洲心理學」(Asian Psychol-

ogy)。可是，他也警告：盲目移植西方心理學的研究典範，固然可能陷入西方「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陷阱，然而，如果每個文化都發展出自己的本土心理學，那難道不也是一種倒反過來的種族中心主義(Ho, 1988)？Poortinga(1996)也作過類似的批評。

在 IACCP 的年會上，Poortinga (2002)再度提出本土心理學主張中所蘊藏的三個吊詭(paradoxes)：1)僅管不同物種之間存有更大的差異。可是，在人類和其他物種之間的比較研究中，卻很少有人會爭議其心理功能的契合性；2)本土心理學預設不同文化間心理功能是不契合的，已經將文化特殊性和文化普遍性兩種研究取向何者較為正確的實徵檢驗排除掉；3)如果分析較為有限的行為層面，實徵資料傾向於顯示較多文化間的變異性；如果從較為廣闊之行為範疇取樣，並將其聚合在一起，則會有較多的文化內變異性。他很直率地指出：大家都已經知道，西方的理論有其時間和空間上的局限性。可是，上述的吊詭卻使人懷疑：另類的研究方案導致的結果在本質上是否必然更為有效。他認為：造成心理學進步的主要限制，並不在於我們不瞭解其他文化和自身文化之間的不同，而是在於我

們忽略了人類心理功能的共同性。

三、文化心理學的第三波

面對主流心理學者的批評與挑戰，本土心理學者必須思考的問題是：他們所主張的研究策略到底蘊藏了哪些內在的難題，這樣的難題該如何克服，才能夠應付主流心理學者的挑戰。我們可以從一個比較宏觀的「內部史」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最近，我曾經寫了一篇論文，題為〈文化心理學的第三波〉(Hwang, in press)，即將在英國心理學會所辦的官方刊物 *The Psychologist* 上發表。在這篇論文中，我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心理學社群曾經有三次較大規模的學術運動，企圖將非西方文化的因素納入心理學的研究之中，他們分別是現代化理論，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研究，以及心理學本土化運動。

第二次大戰期間，歐洲及亞洲的大多數國家都飽受戰爭摧殘，唯有美國本土未曾淪為戰場。戰爭結束之後，美國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及學術的中心；和世界其他國家相較之下，美國人民也享有最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到了 1950 年代，美國心理學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界開始興起所謂的現代化理論，論者認為：要促進國家的現代化，必須要先促進社會中個人之人格取向及心理特徵的現代化。哈佛大學教授 Inkeles (1966) 首先提倡「人的現代化」。並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現代人的特質，以及培養現代人心理特質的方法(Inkeles, 1969; Inkeles and Smith, 1974)。同時也有許多心理學者試圖編制各種版本的「現代性量表」，在各個不同的非西方社會中使用。

到了 1980 年代，在世界冷戰架構二元對立的情勢之下，許多非共產國家的經濟都有相當快速的發展。跨國企業開始崛起，心理學者也開始將其注意力移轉到美國之外的其他文化。荷蘭的組織心理學者，Hofstede (1980) 在 IBM 公司擔任研究部主任的時候，編制了一份測量工作目標或價值的問卷，包含有 32 個項目，並且從 IBM 在 40 個不同國家的員工中取出相等的分層樣本(equivalent, stratified samples)，進行施測。然後計算每一個國家樣本對這 32 個工作價值上簽注分數之平均值，並求得這 32 個「國家平均值」(average nation-value)的相關係數矩陣，再以之作因素分析，最後得到四個因素，它們分別為：個人主義，權力差距(power distance)，男性化，以及不確定性的規

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最後分別標出這 40 個國家在這四個向度上所得的因素分數(factor score)。

Hofstede(1980)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將世界上主要的 40 個國家在這四個文化向度上做出經驗性的定位(empirical mapping)，美國在「個人主義」向度上的得分最高。他的研究立刻引起了心理學社群的高度注意。此後的二十年間，有許多心理學者受到他的啟發，在相關領域中，繼續從事研究。其中最受人注目的，就是有關「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研究。根據 Oyerman, Coon & Kimmelmeier (2002)的回顧，過去二十年間，心理學家們最少編出了 27 種不同的量表，來測量「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傾向(IND-COL)，並完成了難以數計的實徵研究。

大體而言，針對此一主題從事研究的學者大多認為：個人主義是集體主義的對立面。他們假設：個人主義在工業化的西方國家中比其他國家更為盛行，尤其是開發中國家裡較為傳統化的社會。西方社會中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及公民解放(civic emancipation)之過程所造成的社會結構，助長了個人主義的心理叢結，包括強調個人自由，選擇權利，以及自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我實現等等(Trandis,1995)。受基督新教傳統影響較大的國家或族群(ethnic groups)，其個人主義的特徵應當比其他文化傳統的國家明顯。因此，在美國境內，歐裔美國人的個人主義傾向應當比其他少數族群為高，其集體主義傾向則比其他少數群體為低(Osyerman,et.al.,2002)。

我們不難看出：這類研究可以說是「現代化理論」的修正版。從事「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之研究的心理學者雖然不再假設：在經歷現代化歷程之後，其他非西方文化中的個人都可能變成像美國人那樣的現代人，所以他們都是採用特質論(Trait theory)的觀點，以歐裔美國人的心理特徵做為中心，在建構他們對於其他文化族群的圖像。歐裔美國人居於「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之向度上的一端，他們的文化及心理特徵是全世界其他族群的參考座標，後者則被化約成「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向度上的某一點，在該一向度上分別佔據不同位置，他們的文化面貌模糊，必須藉由和美國人的對比，才能夠看清楚自己的心理特徵。Fiske(2002)因此批評這種研究取向：

對美國人和某些西歐人而言，個人主義之所以深具直覺上的意義，可

能是因為：它雖然是盤大雜燴，他卻是我們的雜燴。在我們的意識型態和大眾社會學中，個人主義是美國人界定自身文化之特徵的總和，集體主義則是我們從對照他人(antithetical other)之意識型態的表徵中抽象並形構出來的，世界其他文化的特徵，是我們依照「我們不是那樣的人」而想像出來的。

針對這樣的研究取向，Miller(2002)認為：以集體主義作為基礎的研究取向尚有待發展，Kitayama(2002)則呼籲文化心理學者採取一種系統性的文化觀(system view of culture)來從事研究工作。這樣的呼籲和本土心理學的觀點是互相呼應的。

四、發展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策略

然則，文化心理學者該如何採用系統性的文化觀來從事研究工作呢？2003年七月28日至八月1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五屆亞洲社會心理學會年會」上，Enriquez的嫡傳弟子 Dr. Protacio De Castro 及組織了一個研討會，題為「本土心理學的亞洲觀點：分歧中的統一」(Indigenous Asian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y: Unity in Diversity?)，並邀請我以「本土心理學之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哲學反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思」(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為題，發展成對此一問題的看法。

這篇論文中，我很清楚地指出：本土心理學要想持續發展，必須作三個層次的突破：哲學的反思，理論的建構，和實徵研究。在哲學的反思方面，我認為：我們必須要能夠有一套哲學，它能夠很清楚地告訴我們：(1)對於非西方國家而言，現代化的意義到底是什麼？(2)從十四世紀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科學家所創造出來的知識，和人類各個不同文化在其長期歷史中所發展出的知識，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3)作為科學研究工作者，我們所要追求的知識，到底是什麼樣的知識？

更清楚地說，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科學家所創造出來的知識，和人類各個不同文化在其歷史長河中所發展出來的知識，在本質上是完全不一樣的。不僅如此，科學家以不同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所建構出來的知識，在性質上也會有所不同。我們要了解其間的差異，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今天作為現代學術研究之基礎的科學哲學，根本就是西方文化的產品，我們要想解決發展本土心理學在

知識論及方法論上所遭遇到的難題，一定要對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在 2000 年初，我出版了一本書，題為《社會科學的理路》，書中很有系統地介紹二十世紀間西方十七位主要哲學家對於「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的看法，內容分為(1)實證主義、(2)後實證主義、(3)結構主義、(4)詮釋學、(5)批判理論五大部份，最後一章則以建構實在論作為結尾。這本書前兩部份所介紹的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是適用於自然科學的哲學，可是，由於心理學者大多把心理學定為一種自然科學，因此，它們也經常為心理學者所引用。後三部份所介紹的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則是社會科學家常用的學術典範。

從本書的架構來看，不論是現代化理論或是「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研究，在知識論上都是採取實證主義的立場；在方法論上則是採取化約主義的取徑。本土心理學者在知識論和方法論上雖然各有不同的立場，然而，如果他們將本土心理學界定為一種「科學」，通常他們也是採取實證主義的立場。倘若本土心理學者想要回應主流心理學者的挑戰，並採用一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種系統的觀點來從事研究工作，他們便需要改弦易轍，採取另外一種科學哲學作為其研究的指引。在《社會科學的理路》最後一章所介紹的建構實在論，是維也納大學教授 Dr. Fritz Wallner 所提倡的一種科學哲學。近年來，他組織了維也納學派(Vienna School)，有別於 1930 年代在世界學術舞台上活躍一時的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希望能夠將二十世紀以來科學哲學的發展加以整合。建構實在論將實在(reality)分為三大類：實在自身是人類無法理解的，人類能夠理解的只有某一文化群體在其歷史長河中所建構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以及科學家所建構出來的微世界(microworld)。

在我看來，建構實在論將人類用文字所建構出來的世界區分為「微世界」及「生活世界」的方式，對於我們解決本土心理學所遭遇到的難題雖然極有幫助，可是建構實在論對於這兩個世界的描述卻又不夠詳盡。2001 年十月，在楊國樞教授的號召之下，「華人本土心理學追求卓越計劃」和中央研究院聯合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題為：「本土心理學的科學進展：哲學、文化、與經驗的貢獻」(Scientific Advances i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Philosophical, Cultural, and Em-

pirical Contributions)，Dr. Wallner 也來參加了。我在研討會上所提的一篇論文，經過與會人士的批判討論，我作了大幅度的修改，成為〈建構實在論與儒家關係主義：發展本土心理學知識論策略〉，並把它寄給 Dr. Wallner，他看了之後大為高興，2001 年六月，他在維也納大學舉辦了一個研討會，題為「文化、醫學、與心理學」(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ology)，邀請五位學者，分別從哲學、社會學、人類學、醫學、和心理學的角度，談建構實在論的可能運用，接著又以「科學哲學與心理學」為題目，請我為他的學生舉辦四小時的工作坊。

在〈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策略〉一文中，我綜合以往相關學者的見解，從「建構者、思維方式、理性形態、建構模式、以及世界觀的功能」等五個層面來比較人類所創造出來的知識在生活世界及微世界中到底有何不同。生活世界中的知識是由一個文化群體在其歷史長河中用原生性的思維方式(originative thinking)所創造出來的，創造這類知識的主要目的在於理解外在世界。建構這類知識的途徑是主/客不分的參與式建構，建構出來的知識所強調的是目的和價值的實質理性，能夠賦予個人生命的意義。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科學知識的微世界是由單一科學家用技術性的思維方式(technical thinking)所創造出來的，創造這類知識的目的不僅是在理解外在世界，而且還要預測、控制、操縱外在世界。它所採取的途徑是主/客對立的宰制式建構，建構出來的知識所強調的是價值中立的程序和方法，它能幫助個人認識外在世界，卻不能告訴我們生命的意義。

在非西方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從其生活世界中分化出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系統，像學校、工廠、研究機構…等等，並運用各種科學知識的微世界，從事不同類型的生產工作。然而，當他們離開工作場所，回到生活世界，他們可能又會運用文化傳統所留傳下來的知識，處理生活中的各項事務。在當代的非西方社會裡，許多人的認知系統裡都存有各種不同類型的知識，這些知識有些源自於西方，有些則是承襲自他們的文化傳統，個人則是視其所處情境需要，從其認知系統裡擷取自己認為最「恰當」的知識，來解決自己所遭遇到的問題。至於這些知識的來源為何，當事人很可能自己也說不清楚。

這一點，正是我們之所以要發展本土心理學的主要理由。就這一點而

言，我很欣賞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康瑩儀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叫「特定範疇中的文化理論」(domain-specific cultural theories)。換言之，源自於各種不同傳統的文化理論，常都只在某些特定的範疇中適用，我們從事本土心理學研究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釐清：在哪些特定的情況下，哪種文化理論最可能為人們所使用。

五、本土心理學研究的判準

可是，從建構實在論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只是用實徵研究的方法，在人們的生活世界裡探討特定範疇中的「文化理論」，我們所作的工作便和人類學者相去無幾，所謂「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取向便很難逃脫主流心理學者的批評。如果我們要提昇本土心理學的研究水準，使其不僅能夠被主流心理學者所接受，而且能夠彌補主流心理學者的不足，甚至還能夠取而代之，成為心理學研究的主流，我們便需要用嚴格的學術標準，來建構理論的微世界，並以之作為概念的指引，來從事實徵研究。這樣建構出來的理論，我們一方面要具有普世性，假設它能夠說明人類共有的心理功能，一方面又具有特殊性，能夠說明某一特定文化中人們獨有的心態。

有些從事本土心理學研究的朋友，可能認為：這樣的要求太過於嚴苛。可是，我卻認為：這樣的要求是絕對必要的。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當然每個人都可以建構他自己的「理論」，可是，如果我們假設人類有共同的心理功能，當科學家針對同一範疇中的對象建構不同的理論的時候，各個不同的理論之間便形成一種相互競爭的關係。主張「科學研究綱領」的Lakatos(1978)認為：如果我們要說明我們所提出的新理論(T')比既有的舊理論(T)來得優越，我們就必須要能夠說明：

- (1) T'的經驗內容超過 T；質言之，它能預言新事實，這些新事實按 T 的觀點來看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要被禁止的；
- (2) T'解釋了先前的成功之處：即 T 的所有未被反駁的內容都包含在 T'的內容裡；
- (3) T'的某些超量內容已獲得確認(Lakatos, 1978/1990:154-155)。

更清楚地說，倘若我們假設人類有共同的心理功能，文化所造成的差異僅只是在於心理的內容，那以往有許多心理學者曾經針對同樣的心理功能建構出許多相關的理論。我們要想建構新的本土化理論，不僅要能夠解釋先前理論的成功之處(共同的心理功能)，同時也要能夠說明先前理論

所不能說明之處(特定文化所獨有的特殊心態)。相反的，如果我們不承認人類有共同的心理功能，或者不考量人類有共同心理功能的預設，我們便可以不管別人既有的研究成果，自行建構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理論」，在本土文化中收集實徵資料，來支持自己的「理論」。這樣的理論不但不必接受文化比較研究的效度檢驗，而且也可以拒絕國際學術社群的理性批判。然而，我們卻不能不注意：這樣的研究取向是不是應驗了國內學術界人士對於本土研究取向的批評：「關起門來做皇帝」？

六、本土心理學的未來

講到這裡，我想談談我對台灣本土心理學未來的看法。我最近出版了一本書，題為《科學哲學與創造力》(黃光國, 2001)，書中很明確地指出：今天台灣心理學乃至於整個社會科學低度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的學術界對於西方的科學哲學缺乏相應的理解。在西方，自從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各門學科的發展和科學哲學的發展之間，便存有一種「互為體用」的關係：各種不同科學的發展，成為科學哲學家反思的題材；科學哲學的發展，又可以回過頭來，指引各門科學發展的方向。然而，十九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世紀以來，華人留學生在吸收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大多只專注於學習各種不同的「科學」，而很少注意科學哲學的演變；更少有人嚴肅思考科學哲學的發展和科學研究之間的關聯。長期盲目移植西方學術研究典範的結果，便造成國內科學研究的低度發展。

在這本書的封面上，我引用科學哲學家 Lakatos(1978)在〈科學史及其合理重建〉一文中所說過的一句名言：「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是盲目的。」半世紀來，台灣的心理學乃至於整個社會科學的發展正應驗了這句話的預言：我們沒有發展任何夠份量的科學哲學，在社會科學的各個不同領域裡，也還無法建立具有文化主體性的科學史，許多學科領域的發展只能說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算一步。

在我看來，非西方國家要發展本土的科學或社會科學，其科學研究工作對於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科學哲學思潮的發展，必須要能夠獲致一種「相應的理解」，以之作為未來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背景視域」(horizon)，能夠對西方的理論進行批判，同時又能夠建構適用於本土社會的理

論，並以之作為實徵研究的指引。基於這樣的信念，從 2001 年起，我便以《社會科學的理路》作為教科書，在台大開設「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課程；同時又在台大開設「社會心理學理論」的課，對西方社會心理學理論進行批判；並在一門「工作坊」性質的課程中，教學生如何從事本土性的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

在可預見的未來，本土心理學在台灣的發展可能會兵分兩路：一條路線堅持以西方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性的理論，並從事實徵研究。這樣的研究路線較容易為國際學術社群所接受，其研究成果也比較容易刊登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另一條路線則是以素樸的實證主義或其他的素樸哲學觀作為基礎，在本土社會中從事心理學研究。這樣的研究成果應當也可以在國內的出版市場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但是要想走入國際學術學術社群，則可能遭遇到較大的障礙和困難。

Reference

- Fiske, A. P.(2002). Us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o compare cultures—a critique of the validity and measurement of the constructs:

- Comment on Oyserman et al. (2002).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1), pp.78-88.
- Ho, D.Y.F. (1988). Asian psychology: A dialogue on indigenization and beyond. In A.C. Paranjpe, D. Y. F. Ho, & R. W. Rieber (Eds.), *Asian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pp. 53-77). New York: Praeger.
-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London, England: McGraw-Hill.
- Hwang, K. K. (in press).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Hwang, K. K. (in press). Epistemological goal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 A perspective from constructive realism. In B. N. Setiadi, A. Supratiknya, W. J. S. Lonner, and Y. H. Poortinga. (Eds.), *Unity in diversity: Enhancing a peaceful world. Proceeding of X V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IACCP*.
- Hwang, K. K. (in press). The third wave of culture psychology: The indigenous movement. *The Psychologist*.
- Inkeles, A. (1966). The modernization of man. In M. Weiner. (Eds.), *Moder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Growth*, (pp.151-163). N.Y.: Basic Books.
- Inkeles, A., & Smith, D.H. (1974). *Becoming Modern*.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itayama, S. (2002). Culture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Toward a System View of Cult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1).pp.89-96.
- Lakatos, I.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J. G. (2002). Bringing Culture to Basic Psychological Theory-Beyond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1). pp.110-117.
- Oyserman, D., Coon, H.M., & Kemmeleier, M. (2002). T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1), 3-72.
- Poortinga, Y. H. (1996). Indigenous psychology: Scientific ethnocentrism in a new guise? In J. Pandey, D. Sinha, & D.P.S. Bhawuk (Eds.), *Asian contributions to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p. 59-71).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Poortinga, Y. H. (1999). Do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imply a need for different psychologies?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8(4), 419-432.
- Triandis, H. C. (1995).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Triandis, H. C. (2000). Dialectics between cultural and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185-195.